

东北大豆部分产区亩产提高

国产大豆价格首次低于美国大豆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中美贸易摩擦半年过去了,国产大豆迎来秋收季节。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东北大豆部分产区亩产大量提高,部分产区形势良好

近年来,国家给予作物轮作补助,所以今年开始进行了玉米和大豆的轮作,改善了土壤状态,收成提高很多。

在9月初的一场霜冻过后,让业界普遍担心的国产大豆产量并没有出现大幅下滑。

“今年的收成非常好。”黑龙江当地大豆种植农户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今年的亩产远远超过去年,“去年亩产只有300斤,今年大豆亩产达到了400斤。”

究其原因,该农户表示,近年来,国家给予作物轮作补助,所以今年开始进行了玉米和大豆的轮作,改善了土壤状态,收成提高很多。

4月4日,由于美国方面发布的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此前,美国大豆长期享受3%的低关税。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进口大豆9552.6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大

豆3286万吨。但是以往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的贸易商却“一闪而过”,难觅踪影。随之而来的大豆价格也出现了下滑。

这是近年来国产大豆价格首次低于计税后的美国大豆价格。

豆3286万吨。

据了解,黑龙江省下达的《关于扩大全省大豆种植面积的紧急通知》中指出,国家下达黑龙江省今年新增500万亩大豆种植面积任务。

此外,黑龙江省农业局在已安排1150万亩轮作试点基础上,再新增200万亩耕地轮作试点扩种大豆,每亩补贴1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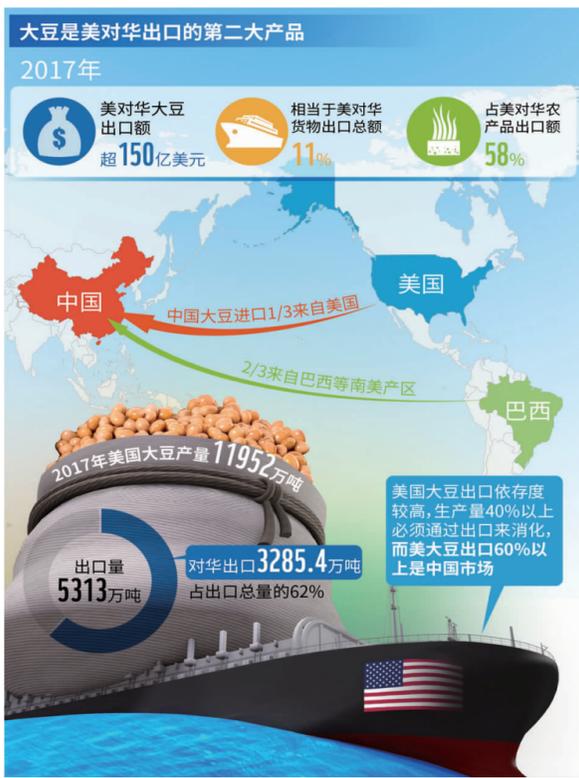
在黑龙江下达扩大大豆面积之前,3月初,黑龙江农民已经大面积扩大大豆种植面积。目前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接近全国种植面积的八成。

“收割机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农户高兴地向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豆也即将进入收获季节。

“目前看,美国的大豆也是丰收。”华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徐建飞向记者表示,“美国大豆的销售压力非常大,因为中国已经不买美国大豆了。”

美国农业部显示:2018/2019年度,美国大豆供给量为1.2773亿吨,比



本报资料室/图

上月预计数增292万吨,比上年度预计数增加821万吨,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之一,其中,大豆产量应该为1.02亿吨左右,而大豆库存量应该在2500万吨。

“美国大豆卖得非常便宜。”徐建飞表示,“芝加哥期货市场的价

格也一直起不来。”

有消息称,美国大豆协会主席John Heisdorffer表示,该协会将继续游说美国政府协商解决方案,停止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大豆期货处于10年低点。

价格下降

这是近年来国产大豆价格首次低于美国大豆,即便和南美大豆相比,国产大豆价格也相差无几。

国产大豆产量上涨的同时,价格却并不如意。

通常,大豆贸易商会在田间地头收购大豆。2017年的收购价格是1.75元/斤。

今年,收购季节来临时,也有贸易商等候在田间。“前几天,开秤价格是1.95元/斤。”农户看到这一价格非常满意。但是很快价格出现了下滑,“过了几天,价格就下跌到了1.90元/斤。”

在后续价格不看好的情况下,农户开始着急出售手中的大豆。

“但是,现在看不见贸易商了,没有人来收大豆了。”农户也很着急:“我们也跟鼓励种植的部门联系了,他们的态度是农户自寻销路。”

农户认为,“因为价格往下行,中间的贸易商不赚钱,会赔钱,所以没人来收大豆了。”

卓创资讯东北大豆分析师贺宇新向记者表示,东北大豆的价格已经跌到了1.70元~1.75元/斤。

“目前国产大豆价格已经低于计税后美国大豆价格了,所以没有人会进口。”贺宇新表示。

这是近年来国产大豆价格首次低于美国大豆,即便和南美大豆

相比,国产大豆价格也相差无几。

9月26日,进口大豆港口分销价格上涨;其中,大连港3500元/吨。

徐建飞认为,另一个影响国产大豆的因素是不久前的储备大豆

拍卖。据了解,为稳定国内粮油市场,确保大豆农利,从2008年10月到今年4月,我国先后4次在东北主产区进行大豆国家收储,总量达到725万吨。2018年7月23日,2008年国家临时收储的大豆和玉米,首次面向市场进行竞价销售,大豆第一批拍卖50万吨。

记者在中国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官网上看到,最近一批交易清单中,2013年黑龙江大豆的成交价格在1.50元/斤左右。

“大豆拍卖得太早了,大企业买了很多储备大豆。”徐建飞透露。

目前中国三大大豆进口国分别为巴西、美国和阿根廷,进口量分别为5093万吨、3285万吨、658万吨,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度已经接近90%。

“国产大豆正常的情况下,大豆需求还是存在着缺口。”徐建飞表示,“可以在年底的时候,再来看价格,会有一些提升。”

贸易摩擦频现 WTO改革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屈丽丽 北京报道

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指出,“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对此,长期代理WTO争端案件的高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姜勇律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虽然WTO改革由于涉及诸多成员国很难获得实际性的进展,但WTO作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核心机制是无法取代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回到多边贸易体制中来,还是诉诸单边主义。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以往需要获得WTO授权才能进行报复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正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引发了人们对WTO改革的进一步关注。”

事实上,早在一个月前,全球化智库(CCG)、日内瓦国际贸易

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及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UIBE WTO Institute)就联合举办了“WTO的现代化改革与未来发展”的圆桌研讨会。在该会议上,CCG顾问、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就表示,“当前WTO面临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使其成员放弃单边主义,回到遵守WTO基本规则上来。同时当务之急是打破法官遴选程序的僵局,以解决

上诉机构的问题。”

CCG高级研究员、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周小明也告诉记者,“此番WTO改革,技术转移将是尤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发达国家的科技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也已实现了利益制度化,但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入这一领域存在很多困难,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此外,农业补贴、国家安全等问题也都需纳入WTO改革范围,这都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WTO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在孙振宇大使看来,WTO目前面临五大挑战和困境:

第一,当前WTO面临最迫切的挑战是如何使其成员放弃单边主义,回到遵守WTO基本规则上来。因此要明确WTO改革的最初目的,同时要有更加严格的纪律防止滥用“国家安全”。把一般商品贸易与国家安全联结在一起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已遭到许多WTO成员包括其盟友的普遍抵制。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WTO应当坚持并有所作为。

第二,对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当务之急是打破法官遴选程序的僵局。不能因为某一个成员的抵制而导致上诉机构瘫痪。多哈回合谈判中已提出许多建议,

以处理好某些裁决超出WTO现有规则范围、陈述与裁决的篇幅过多、案件审理时间过长等问题。总体上,WTO争端解决机制比许多国际和一些国家的司法机构得到更多好评。

第三,要恢复WTO最根本的谈判功能。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现在一些成员旨在推动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企业等新议题的讨论,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十分积极。原因在于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回合”,谈判宗旨是重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诉求。现在这个承诺还没有兑现就马上转入新议题,显得有些生硬。将二者有机结合可能有助于推进新议题。

第四,对于WTO决策机制的

改进已有许多讨论,如何在“完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提高决策效率,是否需成立一个类似执行委员会的机构等,都可通过谈判由全体成员决定。

孙振宇大使表示,“一些成员建议今后更多采取诸边谈判,这种模式成功的效率会更高。ITA(信息技术协定)、GPA(《政府采购协定》)谈判都是成功案例,今后不管这类谈判是否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最终都应朝多边方向发展。”

第五,各成员对新贸易规则都有自己的关注和诉求,下一步对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应当改进与补充。这个协议主要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专利保护出发,但对技术专利的引

进方利益关注不够。

在孙振宇大使看来,“任何政府干预企业,强迫转让技术或者禁止转让技术都是与WTO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应同样鼓励技术的自由流动。正如TRIPS与公共健康问题达成协议一样,要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

此外,孙振宇大使也指出,“现在一些成员如美国抱怨WTO对其不公平,如果说WTO存在不公平的话,首先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特别是乌拉圭回合增加了服务贸易、TRIPS与TRIMS协议内容后,发展中国家在WTO内的权利与义务出现巨大反差。”他建议,讨论WTO改革的方向时,应当对发展中国家的各项关注与诉求给予充分考虑。

贸易争端的解决应该聚焦规则

在日内瓦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Ricardo Meléndez-Ortiz看来,当下全球的贸易动荡虽然不足以彻底颠覆现在的秩序,但这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讨论WTO的问题,而WTO的改革过程实际上是WTO现代化的过程。

“过去两年在政治和贸易领域均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众多争端兴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中美贸易争端。如果各国没有充分的决心,这些争端将很难解决。在不远的将来,国家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贸易层面,在生产、投资、信息交换等很多方面都将变得更为紧密。”Meléndez-Ortiz强调说。

这也意味着,WTO的规则急需“与时俱进”。然而,在技术迭代引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

景下,WTO的作用却在不断弱化,随之兴起的是各种地区贸易机制或者地区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该如何重新看待WTO,如何发挥其作为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

Meléndez-Ortiz则告诉记者,“WTO仍有重要作用,是全球经济重要的助推剂。在WTO改革进程中,重要话题在于改进规则。”目前,日本、欧盟、英国、美国等多国均要求WTO改进规则,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部分原因即和WTO改革相关,而经济模型的选择也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是提出统一的经济方式还是明确一些基本原则,让不同国家在此基础上自行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对此,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Adam Dunnet和美中贸易委员会

中国区副主席Jacob Parker也表示,“WTO改革需要想清楚WTO是一个规定性的还是描述性的机制,是各国都应遵循这个模式还是以原则为基础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Parker看来,“每个国家都应建立自己的规则以促进发展进程,但当它影响到其他国家时就成为了临界点。因此要谨记WTO成为新争议的起因。事实上,WTO需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其实早已存在,但现在忽然间每个人都在热议WTO改革,原因主要来自于特朗普。”

显然,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人们对WTO改革的关注,但在解决机制上却看法不同,Meléndez-Ortiz则指出,“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是对贸易与制造业、贸易与就业的误解。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征收

关税使投资和制造业回流美国,但从长远看并不是明智之举。中国在很多年前提出了改革方案,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实现,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落实。而从责任角度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应聚焦规则层面而不是市场准入层面,两国应在贸易体系中通过积极对话来解决争端。”

此外,Meléndez-Ortiz还谈到了WTO面向未来的改革,“现在WTO仍主要关注货物贸易和关税问题,而信息、数据等尚未被纳入贸易框架,这已落后于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成为WTO改革的重要方面。目前的改革进程正是需要WTO能更及时地适应最新趋势。同时WTO改革也应考虑与低碳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



本报资料室/图

基于全球价值链建立新的贸易对话机制

事实上,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尤其是大数据、AI、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的重构,如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建立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或者正是掩藏在中美贸易摩擦背后更为根本性的一个问题。

对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表示,“在传统贸易协商方面,WTO应在市场准入和贸易规则上设立一套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的贸易对话机制。”

为了实现WTO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改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教授李思奇也提出,“WTO各成员应采取更加开放性和鼓励性的态度对待改革,在WTO机制下设计最佳的诸边谈判方式,并采取包容性、可操作性的诸边谈判方式,设立独立委员会等。”

盛斌教授也建议,“在监管一致性协商上,WTO应考虑设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支持;同时WTO应积极鼓励和提倡多边协商并且尽早将成果多边化。”

“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地区间或区域性的贸易协定的增加,为应对来自高水平自贸协定的挑战,WTO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于地区贸易协定的沟通评估,确保其与《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24条一致。”盛斌说。

不仅如此,面对数字经济有可能形成的新的差距或鸿沟,在发展议题上,WTO应该改革其执行和监测机制,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能够享有特别待遇,提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效率。

“WTO改革是很复杂的过程,被讨论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对现有的WTO规则和条例也不满意。但现在对WTO改革的首轮讨论却由其‘规则制定者’美国、欧盟和日本所提出。中国现在也提出了改革,其目的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希望未来WTO的改革更多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理念与需求。”CCG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表示。

在孙永福看来,最惠国待遇、自由贸易应该成为改革的关键。由于改革非常耗时,因此在改革前就需要找到关键的改革点并在谈判前确定改革的目的。同时,由于成员国数量众多并时常很难达成共识,应由代表发达国家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声音的关键成员率先在一些关键领域达成共识。中国在WTO改革与未来发展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G20等机制可以成为初步讨论WTO改革的平台。